

学 | 术 | 史 | 丛 | 书

陈国球 著

文学史书写形态 与文化政治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学 | 术 | 史 | 丛 | 书

陈国球 著

文学史书写形态 与文化政治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/陈国球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4.3
(学术史丛书)

ISBN 7-301-07002-0

I . 文… II . 陈… III . 文学史—研究—中国 IV . I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3731 号

书 名: 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

著作责任者: 陈国球 著

责任编辑: 张凤珠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7002-0/I·0666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> 电子信箱: zpup@pup.pku.edu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

排 版 者: 北京军峰公司

印 刷 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650mm×980mm 32 开本 12.625 印张 389 千字

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0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“学术史丛书”总序

陈平原

所谓学术史研究,说简单点,不外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。通过评判高下、辨别良莠、叙述师承、剖析潮流,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,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,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——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。至于压在纸背的“补偏救弊”、“推陈出新”等良苦用心,反倒不必刻意强调。因为,当你努力体贴、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,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。

其实,此举并非今人的独创。起码黄宗羲的《明儒学案》、江藩的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已着先鞭,更不要说梁启超、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。至于国外,同类著述也并不少见,单以近年译成中文的为例,便有古奇的《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》、丹尼尔的《考古学一百五十年》、尼古拉耶夫等的《俄国文艺学史》、勒高夫等的《新史学》,以及柯文的《在中国发现历史》等。

即使如此,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中于谈论“学术史”,依然大有深意。一如黄宗羲之谈“明儒”、梁启超之谈“清学”,今日之大谈学术史,也

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。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,希望借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来获得方向感,并解决自身的困惑,这一研究策略,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,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“二十世纪中国学术”。

当初梁启超撰写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只是其拟想中的《中国学术史》之第五种;今人之谈论“学术史”,自然也不会以“二十世纪”自限。本丛书不只要求打通古今,更希望兼及中外——当然,这指的是丛书范围,而不是著述体例。

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,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,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、学派体系,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。在这个意义上,学术史与思想史、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。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,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。想像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,“就学问谈学问”,既不现实,也不可取。

正因如此,本丛书不问“家法”迥异、“门户”对立,也淡漠“学科”的边界与“方法”的分歧,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、文化史方面的著述,均可入选。也许,话应该倒过来说: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、感受传统、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,加盟此项说大不大、说小不小的“文化工程”。

1998年8月4日

前言

“中国文学史”的现代书写传统,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开始,至今已经历一个世纪。但有关“文学史”这种书写活动的本质和意义,或者对相关成果的检讨,却还是晚近时期才比较成熟。早期编制的“文学史”,如谢无量《中国大文学史》(1918)、郑振铎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(1932)等,很多时候会在“例言”、“概论”部分,讨论“文学”或者“文学史”的定义,或者批评前人之作的不足;以专著形式探讨有关问题的早期论著,我们见到的有朱星元(1911—1982)写于 1935 年的《中国文学史外论》(东方学术社出版;朱星元又有《中国文学史通论》之作,天津利华印务局 1939 年印行,是《外论》的修订改写),其中有《文学史方法论》、《文学史写法》、《中国文学史编法》、《中国文学史的起源与其进展》、《中国文学史读法》等章节,看来思虑很周全,可惜内容深度未能配合,对我们探讨相关问题的帮助不大。

近年有关“文学史”书写的研究,多能从比较宏大的框架出发,如陶东风《文学史哲学》(1994),林继中《文学史新视野》(2000)等,都能启发人思。尤其陈平原《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》(1999)中几篇重头文章、戴燕《文学史的权力》(2002)等,对“中国文学史”与“学术政治”、“知识秩序”之间关系的理解,都有深辟的开发,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创获。据悉董乃斌与陈伯海正带领一项“文学史学”的大型研究计划,相信未来会有更

多研究成果陆续面世。

本书的进路与上述的研究有同有异。分别的地方是,本书主要以个别的“文学史”书写文本为对象。简言之,也就是朱星元所提的“写法”和“读法”的进路。本书各章略依时序讨论:由晚清京师大学堂《章程》与现代“文学”学科观念的建立,以至与“文学史”草创期书写的关系开始,到“五四”前后胡适以“白话文学运动”建构影响深远的文学史观,再到40年代林庚以“诗心”唤起“惊异”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转到由中原南迁的柳存仁和司马长风在50年代及70年代香港进行的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史书写,最后以两种“进行中”的书写活动为对象,看“中国文学史”要添加“香港文学”部分时,或者“香港文学”要进入“文学史”的过程中,所要应付的各种书写问题。时间上,由晚清到今日;空间上,由中原到边陲。所论是个别、具体,但思考的问题却不限于一隅。本书要探索的问题,与选定要讨论的“文学史”著作有关。有关“文学史写法”,以柳存仁一本适用一时的“教科书”,探讨“文学史”的“叙事”与“再现”问题,以林庚的“诗性书写”叩问“文学史”有没有可能靠近文学的经验,以京师大学堂《章程》及林传甲的“国文讲义”看早期“文学”与“文学史”观念的模型或者错置,以叶辉代表的“文学批评”进路,观察当前的、在地的,另一次“文学史”书写草创期的现象。本书各章还试图透过各个文本间的相应或对照关系——如“五四”时期以胡适为代表所开创的文学史观,在柳存仁、司马长风于殖民地香港的书写中产生的不同作用;又如梁启超、张百熙、张之洞等在构思大学的“文学教育”时,林庚在放弃“诗性逻辑”时,“中国文学史”要把“香港”写入时,所面临的种种抉择——探析“文学史”书写与“文化政治”在不同层次的交缠纠结。至于本书“附编”三章,《文学史的探索》是个人有关“文学史”思考的一些初步见解,《文学·结构·接受史》、《文学结构与文学演化进程》两章,是透过对“布拉格学派”的阅读,帮助自己建立有关议题的思辨基础。附载于此,作为个人对“文学

史”问题学习的一些纪录。

本书的目标,是提出问题以供进一步思考;而思考的过程,或者就是学术探索兴味最深之所在。

学术史丛书书目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中国禅思想史 | 葛兆光 著 |
| ——从 6 世纪到 9 世纪 | |
|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| 阎步克 著 |
|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 | 王 瑶主编 |
|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| 陈平原 著 |
| ——以章太炎、胡适之为中心 | |
| 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 | 王永兴 著 |
|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| 赵 园 著 |
| 儒学南传史 | 何成轩 著 |
| 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 | 郭双林 著 |
|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 | 陈平原主编 |
| 文学史的权力 | 戴 燕 著 |
| 《齐物论》及其影响 | 陈少明 著 |
| 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 | [香港]陈国球 著 |
| *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| 夏晓虹 著 |

文学史研究丛书书目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 | 孙玉石 著 |
| 小说史:理论与实践 | 陈平原 著 |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上海摩登 | [美]李欧梵 著 毛 尖 译 |
| ——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—1945 | |
| 北京：城与人 | 赵 园 著 |
|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| 陈平原 著 |
| 晚清至五四：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| 杨联芬 著 |
| 词与文类研究 | [美]孙康宜 著 李奭学 译 |
| 唐代乐舞新论 | [台湾]沈 冬 著 |
| *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| 陈平原、钱理群、黄子平 著 |
| * 被压抑的现代性：晚清小说新论 | [美]王德威 著 宋伟杰 译 |
| * 中国当代新诗史 | 洪子诚 著 |
| * 汉魏六朝文学新论 | [台湾]梅家玲 著 |
| ——拟代与赠答篇 | |
| * 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 | [日]木山英雄 著 赵京华 译 |

其中画 * 者为即出。

目录

“学术史丛书”总序 陈平原/1

前言/1

第一章 文学立科

——《京师大学堂章程》与“文学”/1

一 “词章不能谓之学”：《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》与“文学”的边缘化/2

二 “大学堂设文学专科”：《钦定》与《奏定》两份章程与“文学研究”的观念/11

第二章 “错体”文学史

——林传甲的“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”/45

一 “第一本中国文学史”与林传甲的“国文讲义”/46

二 “国文讲义”与《支那文学史》及《奏定章程》的关系/50

三 《中国文学史》的文学史意识/56

四 结语/59

第三章 “革命”行动与“历史”书写

——论胡适的文学史重构/67

一 “白话文学”与“文学进化观”/68

二 从宋诗到“俗话文学”/83

三 作为“遗形物”的中国文学/92

四 传统的消逝/97

第四章 “文化匮乏”与“诗性书写”

——林庚《中国文学史》探索/107

一 “启蒙”、“黄金”、“白银”、“黑夜”/108

二 “文化匮乏”情意结/111

三 惊异精神/115

四 故事性结构/123

五 诗性书写/128

六 结语/137

附录 思接千载 视通万里

——论林庚诗的驰想/148

一 视域的开展/149

二 窗框中的风景/151

三 浪漫主义的“现代派”/155

四 艺术与生活/160

五 结语/169

第五章 叙述、意识形态与文学史书写

——以柳存仁《中国文学史》为例/177

一 历史与文学·“历史”与“文学史”/177

二 “文学史”与求真/180

三 作为叙事体的“文学史”/184

四 在历史中的叙事体/188

第六章 诗意与唯情的政治

——司马长风文学史论述的追求与幻灭/204

一 从语言形式到民族传统的想象:一种乡愁/
205

二 诗意的政治:无何有的“非政治”之乡/218

三 唯情论者的独语/236

第七章 “香港”如何“中国”

——中国文学史中的香港文学/262

一 “香港文学”在香港/262

二 “香港文学”在中国/265

三 把“香港”写入“中国”/271

四 “香港”如何“中国”? /279

第八章 书写浮城

——叶辉与香港文学史的书写/291

一 浮城·书写·香港/291

二 “文学史”的兴起/292

三 文学·现实;香港·中国/295

四 港味·粤味/301

五 华南·双城·香港/304

六 个人·历史/307

七 余话:书写浮城/309

附编一 文学史的探索

——《中国文学史的省思》导言/317

附编二 文学·结构·接受史

——伏迪契卡的文学史理论/326

一 捷克结构主义/326

二 布拉格语言学会与伏迪契卡/329

三 伏迪契卡的理论立场/330

四 “文学结构的演化”和“作品的生成”/333

五 文学作品的接受史/336

六 结语/349

附 录 论布拉格学派的术语“aktualizace”/350

附编三 文学结构与文学演化过程

——布拉格学派的文学史理论/362

一 文学结构的动力/362

二 演化价值与美感价值/365

三 作家与文学结构的关系/369

四 文学作品的“生命”/372

五 文学与社会/376

六 结语/382

后记/388

作者简介/391

第一章

文学立科

——《京师大学堂章程》与“文学”

“词章不能谓之学”：《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》与“文学”的边缘化

“大学堂设文学专科”：《钦定》与《奏定》两份章程与“文学研究”的观念

清朝末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，与中国现代学科规范的建立与学术发展关系极大。虽然有学者指出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是成立于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的北洋大学堂；^{〔1〕}若与京师大学堂的宗旨和规模比较，这只能算是西学专科的学堂，因为京师大学堂创立的目标，正如《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》所云：“为各省之表率，万国所瞻仰。规模当极宏远，条理当极详密”（汤志钧、陈祖恩，125）；其政治文化的象征意义，远远超过北洋大学堂或者其他新式学堂。

京师大学堂筹措成立的时候，传统学问正遭受强烈挑战，西学的承纳已势在必行；公共言说的重心只在于如何调和“中学”与“西学”（参王尔敏，52—100；丁伟志、陈崧，240—257；张灏，126—197）。大学堂作为重要的国家

建制,其创制规式(特别是其中课程的规划)当然反映了当时“中学”与“西学”在中国争持互动的境况。“文学”,由于其本质与民族文化的众多元素互相依存,被界定为“中学”的一部分也理所当然;然而,在现代新式大学中,这门传统的学问却又变成必不可少的一个学科。重新考察京师大学堂创设的构思过程,可以帮助我们了解“文学”在介入“中西学”的争持时,其内容和存在模式究竟遭遇了哪些考验、以何种形态出现。只有在“文学”的学科地位确立的情况下,“文学史”才有机会成为系统知识;尤其是向来被认作第一本的林传甲《中国文学史》,与京师大学堂及其章程又有深刻的关系。

本章先就京师大学堂创立期间先后出现的几个章程做出考察。大学堂正式开办的初始阶段,由于种种客观原因,难以事事照章执行;然而,我们却不能把这几个章程看做“数纸虚文”而轻忽其意义。因为参预撰制章程者如梁启超、张百熙、张之洞等,都是当世认真面对中西学问交接碰撞所引发众多问题的代表性人物;章程之立,反映了他们对文化传统、学术理念,以至世变时局的全盘思考。下文所以据此尝试探讨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大气候底下,“文学”如何被措置,最后进占学术体制的一个重要位置。至于由此衍生的“文学史”名目、概念与书写如何纠合或者离异,则在下一章处理。

一 “词章不能谓之学”:

《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》与“文学”的边缘化

京师大学堂的创立章程先后共有三个,分别是《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》、《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》和《奏定大学堂章程》。《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》是三个章程中的第一个。为配合“维新变法”,清德宗督促总理衙门积极筹办京师大学堂,光绪二十四年五月(1898年7月)总理衙门终于呈上《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》。这个章程是总理衙门请托于康有为,再交由梁启超起草的。^[2]

《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》共七章:第一章《总纲》,第二章《学堂功课例》,第三章《学堂入学例》,第四章《学成出身例》,第五章《聘用教习例》,第六章《设官例》,第七章《经费》,第八章《新章》(汤志钧、陈祖恩,125—136)。整个

章程只是纲领性质,不算详尽。第八章《新章》中亦声明所列“不过大概情形”,开办后还需“随时酌拟”(130)。然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两点比较重要的讯息:一、以“中西并重,观其会通”为宗旨;二、在“会通”的具体调配下,“文学”的学术位置明显不重要。

(一)“中西并重,观其会通,不得偏废”

中学西学的对立和纠结互动,是晚清学术和文化的重要议题。《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》的草拟者梁启超,是清末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,也是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现代思想新方向之间的重要枢纽(Chang Hao, 296—307)。以他个人的思想发展路向来说,“西学”又是一个起关键作用的元素。他在构思大学堂的课程时,自然会就自己所掌握理解的中西学术做出调度安置,以建立一个理想的教育框架。^[3]

要了解戊戌时期梁启超的学术倾向,他的《三十自述》可以作为一个讨论的起点。文中追记梁启超早年的学习生活:和当时许多传统读书人一样,他早年读书只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;沉浸于词章帖括之中,“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,更有所谓学也”。后来他又就学于两广总督阮元主持的学海堂。阮元以经学训诂和骈文有名于世,学海堂的学风当然具备这种特色;^[4]梁启超的为学倾向也有些改变,“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,颇有所知,辄沾沾自喜”。光绪十六年(1890)梁启超初会康有为以后,“决然舍去旧学”;^[5]这时他心中真正的“学”,就是康有为指导的“陆王心学”、“史学”、“西学”(《饮冰室合集》11: 16—17)。随后他就学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,学习义理之学、考据之学、经世之学、文字之学;大概“以孔学、佛学、宋明学为体,以史学、西学为用”(梁启超《南海康先生传》,《饮冰室合集》6: 62, 65)。^[6]

光绪二十二年(1896)梁启超发表《变法通议》,其中《学校总论》批评当时的“士而不士”,而“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,于历代掌故,瞭然未有所见,于万国形势,瞢然未有所闻”;所以他一力赞成“今之言治国者,必曰仿效西法,力图富强”,又提出学校的兴办,应该“采西人之意,行中国之法,采西人之法,行中国之意”(《饮冰室合集》1: 14—21)。梁启超自己的追记、总结学